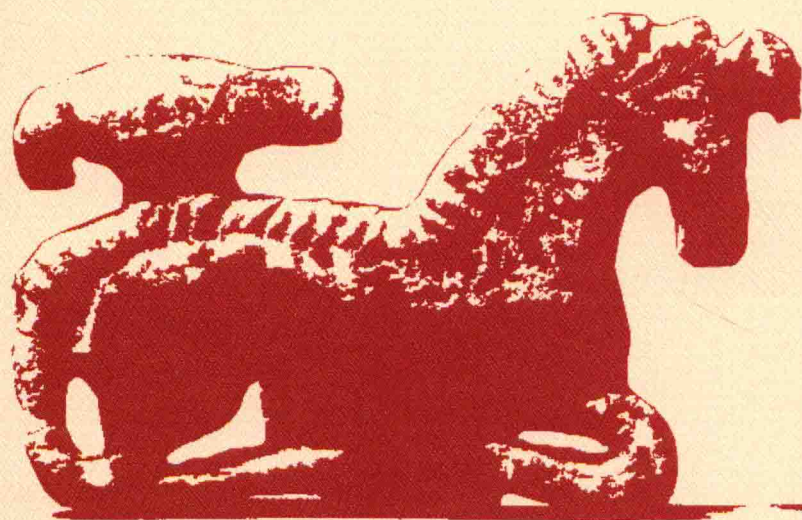


总主编 邵汉明 刘信君

栾凡 著

东北游牧文化

东北游牧文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東北文化叢書

总主编 邵汉明 刘信君

东北游牧文化

栾凡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游牧文化 / 栾凡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9

(东北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3225 - 1

I. ①东… II. ①栾… III. ①游牧民族 - 民族文化 - 文化研究 - 东北地区 IV. ①K2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9677 号

东北文化丛书

东北游牧文化

著 者 / 栾 凡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韩莹莹

责任编辑 / 李帅磊 韩莹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87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225 - 1

定 价 / 1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东北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 马大正 李治亭

主 任 邵汉明 刘信君

副主任 黄松筠 王 卓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玉强 曲晓范 刘厚生 衣保中 安文荣

李德山 杨 军 宋月华 张福贵 武玉环

郑春颖 郑 毅 赵永春 赵英兰 逢增玉

曹保明 韩世明 程妮娜 雷丽平

主 编 邵汉明 刘信君

副主编 黄松筠 王 卓

关于边疆民族文化特色化发展的思考

——《东北文化丛书》序

马大正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东北文化丛书》皇皇十二卷，付梓在即，丛书总主编之一邵汉明院长嘱我书序。想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多年来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汉明院长也是与我相知多年的研友，因此为丛书出版盛事写几句感悟也在情理之中。思之再三，斗胆妄论陋见如下。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价值集中表现在民族素质的形成和国家形象的塑造上。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必然会持久地影响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同一民族通常具有共同的精神信仰、价值取向、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人们正是通过这种共同的文化，获得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文化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黏合剂”，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国家统一固然取决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文化却是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稳定性、深层次的战略要素。

中华文化因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多元状态。自春秋至战国，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经大体形成。秦汉以后，华夏族群继续与周边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经唐、宋、元、明、清历代发展，终于奠定中国

辽阔领土，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广阔天地。历史上，在中原和周边多种经济文化之间，不断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进行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融合。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最终形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由于地理差异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中华文化内部呈现南北、东西差异。在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中华各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多民族文化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下，边疆民族文化的特色化发展面临极好的机遇，也面临形形色色的挑战。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我认为正确处理好如下三个辩证关系，对边疆民族文化的特色发展极为必要。

1. 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我们这里讲的整体，首先是指由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中华文化，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是由 56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其次是指构筑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各个地域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这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概念和实体。相对于上述中华文化的整体和全局，边疆民族文化则是一个局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文化和各地域文化，包括边疆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和各地域文化，包括边疆民族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互相补充，造就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宏大气象，显示了中华文化多样性、包容性、互补性和创新性的特色。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边疆民族文化，除了上述多样性、包容性、互补性和创新性特色外，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鲜活的民族性。边疆民族文化的存在和补充，使中华文化出现争奇斗艳、绵绵不绝的奇观，让每一位中华儿女增添了无限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豪情。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忘却整体，或将整体和局部倒置，必然造成将因

存在地域性和民族性而产生的差异性置于中华文化主体之上。若如此，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对文化发展本身也是无益的。

2. 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生活在边疆地区的诸多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传统、文化特色。对此，今人面临如何传承和如何创新的任务。所谓传承，即继承和发扬边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所谓创新，一是对传统文化不能墨守成规，要与时俱进；二是对传统文化的糟粕要摒弃、要改造。须知尊重文化传统的最高境界，是使文化传统有活力、不断创新。

在创新时，要注意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对任何文化，包括边疆民族文化的价值不能只说好，而要指出其不足。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讨论也是这样。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说：“尽管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些现象继续存在，但在半个世纪后，再利用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来解释黑人的成就不足，已经说不过去了。”其二，对边疆民族文化的改进与创新，必须依靠本民族群体的共同努力，自下而上地有序推进，切忌迷信行政权力的强制推行和非本民族力量的介入，若此，效果必然适得其反，甚至出现强烈反弹。当然国家的指导、相关政策的引导和现代文化的引领是必不可少的，是十分重要的。

3. 正确处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对维护国家统一具有以下几个特殊功能。

一是标识民族特性，塑造认同心理。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基本特质和身份象征。在一定民族地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传统，塑造了该民族成员的共同个性、行为模式、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并表现为一定的民族心理或我们通常所说的国民性。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基本依据，“崇尚统一”是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数千年来，国家统一一直被视为国家的最高

政治目标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一切政治活动通常都以国家统一作为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这种民族心理沉积于中国社会和价值系统的最深处，主导着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生活方式和主流价值观念。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分有合，但不论是割据时期还是统一时期，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意识，这就是国家统一意识。中华文化这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为遏制割据倾向、凝聚统一意志、消除政治歧见提供了最坚固的精神堤防。

二是规范社会行为，培育统一意识。在社会通行的准则规范和行为模式中，通常总是潜隐着一整套价值观念体系，这一系统始终居于民族文化体系的核心部位，自觉或不自觉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每个民族成员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世代相传地承受着同一文化传统，个人的价值观念就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耳濡目染中构建起来的。不仅如此，人们在文化的内化过程中，还会把民族共同的价值观转化为自己的内在信念，从而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中获得认同感和依赖感。“大一统”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意识之一，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基本社会理念和普遍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追求统一的价值取向，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始终如一，从未出现过文明断层的历史悲剧。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统一的文化理念主导着统一的实践，“大一统”的政治实践反过来又强化着人们追求统一的信念。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不高度重视“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巩固与维护，无不致力于探索天下分合聚散的规律与对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军事战略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文化认同不仅为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而且为军事等物质力量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平台。

三是凝聚民族精神，强化统一意志。中华文化的价值意识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内聚性、亲和性和排异性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一特性决定了每当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关键时刻，民众都会激发出强大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正是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所

认同的道德规范。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是国家认同心理的深层源泉。爱国主义就是这一精神的集中反映。中国历经治乱分合而始终以统一为主流，正是得益于以国家统一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民族精神。数千年来，无论是庙堂之上的统治者，还是江湖山野间的老百姓，都普遍认为唯有实现“大一统”，国家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民族才能得到应有的尊严，天下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虽然多次出现过割据局面，但是在古代典籍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主张割据分治的学派，反而都把“天下一统”作为政治斗争的原则与旨归。尤其是每次统一战争爆发之前，社会上总会出现一股势不可挡的统一潮流，每当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刻，社会内部总会产生一种捐弃前嫌、同仇敌忾的强大意志。中华文化所拥有的这种统一意志，为维护国家统一奠定了坚韧无比的精神国防。离开这种精神的支撑，政治、军事上的统一是难以持久的。

文化认同的上述功能，在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内显得异常重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文化认同始终是政治家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主题。《周易》早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知，南朝萧统提出过“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治国方略，龚自珍发出了“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警告。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政治注重“文化立国”的历史传统。正是这种将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基础的价值取向，为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统一奠定了坚实的信念和基础。纵观历史，当统一形成共识然而阻力重重时，文化认同的力量更能显示出“硬实力”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可以说，文化认同就是政治，文化认同就是国防，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只有有文化认同的基础，才能更加稳固与持久。归之为一就是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牢固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便是脆弱的；只有将文化认同的基础工作做扎实，国家认同才能经得住风浪的考验。

无须讳言，在边疆地区，特别是在一些与中华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

边疆民族文化地区，实际上存在着如下四个值得警示的倾向：第一，地缘政治方面带有孤悬外逸的特征；第二，社会历史方面带有离合漂动的特征；第三，现实发展方面带有积滞成疾的特征；第四，文化心理方面带有多重取向的特征。

一旦认识不正确，随之处理不当，这些倾向就将对国家的向心力、民族凝聚力产生消极影响。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

国家、民族、文化是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也是国家社会构成的三个基本层面。

国家的统一取决于国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国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或者说，没有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就没有国家的统一，也就没有一个国家立足于世界的基础。国家的认同，从根本上体现在民族的认同上。这里的“民族”，不是单一族裔的“族群”，而是整合于一体的国家民族，在中国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认同，归根到底是56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中国稳定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和高度出发，还应包括全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认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出“四个高度认同”，即统一多民族中国的高度认同、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认同，并开展“四个高度认同”思想工程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回顾这些年我们走过的历程，如果说“三个离不开”活动致力于杂居一地的不同族群感情上的融合，如果说“五观”教育引导各族人民对民族大团结的理性认识，那么，这种感情和理性的升华经过“高度认同”思想工程，将最终导入更深层次即心理上的认同，使边疆各族人民正确认识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不断增加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和现代意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在任何国家，国家认同的建设都是一个长期艰苦的事业，中国也不例外。我们还是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体制上的。国家认同、国

家制度的建设、国家制度与人民的相关性，这其中存在着很大关联。国家制度必须能够向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公共福利，使人民在感受到国家权力存在的同时，获取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利益。同时，人民参与国家政权的机制也必须加紧建设。如果人民不能成为国家政权或者政治过程的有机部分，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就会缺少机制的保障。另一方面就是“软件”建设，即国家认同建设。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国家认同感，中国就很难崛起。

应当指出的是，国家认同建设与民族主义相关，但它并不等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反而会阻碍中国真正崛起。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的融合是大趋势，容不得任何一个民族走狭隘民族主义路线。再者，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狭隘的民族主义最终会是一条孤立路线，它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

如何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如何在加紧民族国家建设的同时迎合全球化的大趋势？如何在强调人民参与政治的同时维持中央政府的权威？这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东北文化丛书》以东北农耕、渔猎、游牧、宗教、服饰、饮食、建筑、民俗、文学、流人、移民、域外文化诸题立卷，对独具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东北地域文化，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从源流、内涵到形成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历史地位、社会价值，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深入系统的阐论，充分展现了东北地域文化在东北边疆，乃至东北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东北地域文化之于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共同性，及其自身的多元性和独特性。

综观丛书各卷，其特色有如下五端。

一是体例上的正确选择。丛书选择了中国传统志书的体例，采用“横排竖写、事以类从”，“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形式展开。从不同

文化横向和纵向视角观察中，选择了横向的视角，即对每一选题分立若干子项目、子选题，每一个层面构成每一卷的章和节，坚持了传统志书的体例，避免写成不同类别的诸如东北宗教史、东北服饰史、东北移民史、东北流人史、专门文化等等，体现了主编的意图、丛书的特点。

二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宏观把握起到引领作用，通过微观叙论以印证。宏观是对各类别文化整体的把握和宏观的概括，同时又将整体的把握、宏观的概括和评议，建立在微观的论述、微观的阐释基础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宏观为统领，以微观阐释为重心。

三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东北地域文化是东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既有交融，又有不同。研究东北地域文化，共性和个性问题不容回避。这里的所谓共性是指中华民族文化，所谓个性是指东北地域文化，包括东北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丛书在强化共性、同一性的阐述基础上，正确阐释个性的特色，做到了突出共性、阐释个性。

四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的结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北的黑土地养育了东北人。人文历史的演进、东北地域文化的形成和演变，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因素，但东北地域文化的形成还是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精神文明的创造人的因素才是第一位的。这个主次关系必须把握好。

五是学术性与知识性相结合，以学术性为主。丛书立足学术，坚持学术性、知识性兼具的原则，并在大众化上颇下功力。丛书做到了叙事通畅，雅俗共赏，还根据各卷内容特色，将具有地域特色的服饰、饮食、建筑、民俗诸卷配发彩色图版，在图文并茂上做到精益求精。

拉杂写来，自感所言诸项仅仅是有感而发，错谬之处，还望专家和读者大众指正。

权充序，愧甚矣！

2018年2月25日 草成于北京自乐斋

总前言

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包括能够被传承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文学艺术、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自然地理范围内，经过长期历史过程形成的，为当地人民所熟知、所认同，带有地方文化符号特点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其包括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诸方面。地域文化首先在于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古代交通不便和行政区域的相对独立性，各地的文化形态具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呈现丰富多彩的多样化。地域文化划分的标准具有多重性，如以地理相对方位为标准划分，则分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南方文化、北方文化、东北文化、西北文化等；如以地理环境特点为标准划分，则分为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松辽文化、运河文化、大陆文化、高原文化、草原文化、绿洲文化、岭南文化、海疆文化、长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等；如以行政区划或古国疆域为标准划分，则分为齐鲁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

文化、关东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八桂文化、黔贵文化、青藏文化、西域文化、徽文化、赣文化等。正因为有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中华民族才拥有了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从而屹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历史非常悠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域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成立了众多地域文化研究的专门机构。如燕赵文化研究中心（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华夏文明研究中心（山西省委宣传部）、晋学研究中心（山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宁夏大学）、草原文化研究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内蒙古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塔里木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师范大学）、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殷商文化研究所（郑州大学）、楚文化研究所（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荆楚文化研究中心（长江大学、荆州博物馆）、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武汉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中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基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大学）、江淮文化研究所（合肥学院）、赣鄱文化研究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赣学研究院（南昌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省越文化研究中心（绍兴文理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云南大学）等。

二是开展了对各地域文化发展史和文化现象、文化特征的梳理工作，出版了一大批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出版的全国性地域文化丛书有：《中国地域文化丛书》24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998），《中国地域文化大系》6种（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中华地域文化研究丛书》5种

(学林出版社, 1999),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34卷(中华书局, 2013), 《客家区域文化丛书》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中国北方地域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4), 《中国南方地域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4), 《中国海洋文化丛书》14卷(海洋出版社, 2016); 出版的某一省市或某一地域文化丛书有: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4种(宁波出版社, 1999), 《楚文化知识丛书》20种(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荆楚文化研究丛书》8种(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徽州文化全书》20卷(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巴蜀文化研究丛书》(巴蜀书社, 2002), 《齐文化丛书》22卷(齐鲁书社, 1997), 《魅力长治文化丛书》10卷(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 《东港文化丛书》6卷(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20册(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 《中原文化记忆丛书》18卷(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人文肇庆系列丛书》9册(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2), 《湖湘文库》702册(岳麓书社, 2017), 《沅陵历史文化丛书》10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陕西历史文化遗产丛书》3册(陕西旅游出版社, 2015), 《邵阳文库》201种218册(首批41种)(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 《代县人文丛书》4种16卷(三晋出版社, 2016), 《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10种(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第二辑10种(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此外, 《岭南文库》350种、《岭南文化知识书系》300种, 《闽南文化研究丛书》14册、《闽南文化百科全书》14卷也在陆续出版。此外, 还出版了数百种专著、专书。

三是创办了一批专门发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文章的刊物, 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如《地域研究与开发》(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82年创办)、《东南文化》(南京博物院1985年创办)、《西域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1991年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教育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93年创办)、《中华文化论坛》(四川省社科院1994年创办)、《地方文化研究》(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3年创办)、《中原文化研究》

(河南省社科院 2013 年创办)、《地域文化研究》(吉林省社科院 2017 年创办)。此外,《社会科学战线》《学习与探索》《北方论丛》《边疆经济与文化》《学术月刊》《江海学刊》《江汉论坛》《广东社会科学》《福建论坛》《齐鲁学刊》《东岳论丛》等刊物也设有研究地域文化的专栏,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

就东北地区而言,成果亦十分丰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立了地域文化研究方面的机构:东北文化研究院(吉林师范大学)、萨满文化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长春师范大学)、东北建筑文化研究中心(吉林建筑大学)、萨满文化研究中心(长春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东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大连民族大学)等。这些研究机构,对于深入研究东北文化起到重要作用。二是出版了一批有关整个东北地域文化研究的丛书或专著。有关整个东北地域文化的代表作有:《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满族民俗文化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关东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东北文学文化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松辽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东北三省革命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中国东北草原文化丛书》第一辑、第二辑(长春出版社,2015)等;分省、市文化丛书或专书的代表作有吉林省的《松原蒙满文化系列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吉林卷(中华书局,2013),《吉林文学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松原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吉林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17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2017),《通化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辽宁省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沈阳地域文化通览》(沈阳出版社,2013),《鞍山文化丛书》18册(春风文艺出版社,2015),《沈阳历史文化丛书》10册(沈阳出版社,2017)。黑龙江省的《中国地域

文化通览》黑龙江卷（中华书局，2014），《黑龙江历史与文化研究》首批66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2017）。《辽河地域文化系列丛书》《牡丹江地域文化丛书》正在陆续出版中。此外，出版了一批资料性很强的书籍和工具书，如《长白丛书》百余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2018），《东北历史与文化论丛》（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关东文化大辞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吉林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等。三是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

综上可知，全国包括东北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已经有了较深入的研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如研究力量分散，各自为战，自说自话，缺乏整合；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明显滞后，缺乏比较研究；研究成果粗线条的较多，高质量的精品力作较少。

就东北地域文化而言，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思考。首先，就研究机构而言，成立的专门研究东北文化的机构并不多，许多有实力的大学，如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等没有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东北三省社会科学院也见不到相关机构。至于创办的研究文化的专门刊物，也只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地域文化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其次，关于东北地域文化的命名问题，很不统一。最常见的有“东北区域文化”“东北文化”“关东文化”“松辽文化”“松漠文化”“辽海文化”“辽河文化”“长白山文化”“龙江文化”等。东北地区文化名称的不统一，反映了学者们认识上的差异，实则是存在分歧。鉴于后五种称谓地域狭小，有以偏概全之嫌，故舍弃不论。前四种称谓中，“东北区域文化”“东北文化”是以地理相对方位为标准命名的，“关东文化”是以古代行政区划和历史沿革为标准命名的，“松辽文化”是以地理环境特点为标准命名的。我们采用了“东北文化”之名称，主要考虑当代人们